

《午夜之子》中的后现代伦理

Postmodern Ethics in *Midnight's Children*

李珍玲 (Li Zhenling) 宋 昀 (Song Yun)

内容摘要：在《午夜之子》中，萨利姆既是故事主人公又是故事叙述者。作者拉什迪借萨利姆的故事和叙事，表达对后殖民印度社会的深层思考，带有教诲意味；作为故事主人公的萨利姆一生坎坷，尝尽冷漠与苦楚，却仍心存善念和希望；作为叙事者的萨利姆，在语言的狂欢中放纵情感，消解权威。鉴于此，本文基于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理论，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结合后殖民印度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深刻探查萨利姆的生命历程和叙事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还原拉什迪对印度现实的批判和重构，从而挖掘小说的伦理价值。本文发现，《午夜之子》是一次重构后殖民时代印度社会道德关系的伦理叙事。小说批判后殖民现实对萨利姆、午夜之子和贫民窟居民等弱势群体他者的迫害和暴力，宣扬蕴藏在他者身上的真善美和进取力量，以此呼唤一个以友爱、和平、平等为道德规范的印度社会。与此同时，小说采用“腌制化”写作、不可靠多角度叙事和非线性叙事等手法解构印度历史的权威，试图建构起包容多元的印度景观。

关键词：《午夜之子》；萨利姆；后现代伦理；后殖民印度；他者

作者简介：李珍玲，文学博士，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英美文学研究；宋昀，文学博士，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旅行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20世纪美国旅华文学的中国书写研究”【项目批号：23BWW014】阶段性成果。

Title: Postmodern Ethics in *Midnight's Children*

Abstract: In *Midnight's Children*, Saleem is both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narrator. Through Saleem's story and narrative, Rushdie expresses his deep thoughts on post-colonial Indian society, carrying a sense of ethical teaching. As the protagonist, Saleem leads a difficult life full of indifference and suffering, but never losing faith and hope in his mind; as the narrator, Saleem indulges his emotions and dissolves authority in linguistic carnival. Based on postmodern Western ethical theory,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o deeply investigate Saleem's life journey and narrative strategy in the complex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of postcolonial India, restore Rushdie's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Indian reality, and discover the ethical value of the novel. This paper finds that *Midnight's*

Children is an ethical narrative that reconstructs the moral relations of postcolonial Indian society. The novel criticizes the persecution and violence of postcolonial India against the disadvantaged others, such as Saleem, midnight's children and the slum dwellers, and proclaims the true beauty and progressive power hidden in the others, thereby calling for an Indian society in which love, equality and peace are the moral norms. At the same time, the novel uses "pickled" writing, unreliable multi-perspective narratives and non-linear narratives to deconstruct the authority of Indian history, attempting to construct an Indian landscape that embraces diversity.

Keywords: *Midnight's Children*; Saleem; postmodern ethics; postcolonial India; the others

Authors: Li Zhenling is Research Fellow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lizhenling@szu.edu.cn).

Song Yun is Lecturer of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59,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situated in the transpacific area (Email: songyun@cczu.edu.cn).

《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 是萨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的成名作。长久以来, 相关研究多把该小说视为典型的后殖民国家寓言, 对其中的后殖民政治和民族建构等主题进行了全面解读和分析。¹ “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14)。近年来, 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学界的兴起, 一些学者开始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 结合后殖民理论对该小说进行重新探查。² 的确, 小说围绕着伦理问题展开: 主人公萨利姆一直在“成长”的问题上停留和挣扎, 这就构成了小说中的“伦理线”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20), 而他围绕这条伦理线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和作出的“伦理选择”³, 则构成了这条伦理线上持续存在的“伦理结”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20)。以往学者忽略的一点是, 小说对伦理问题的探讨, 不

1 参见 Timothy Brennan, *Salman Rushdie and the Third World: Myths of the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2 参见 徐彬: “拉什迪的斯芬克斯之谜——《午夜之子》中的政治伦理悖论”, 《外语与外语教学》4 (2015): 86-91; 徐彬: “后殖民伦理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 聂珍钊、王松林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第 136-153 页。

3 有关“伦理选择”这一术语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钊: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 《文学跨学科研究》4 (2022): 563-568 等论文。

仅带有后殖民特征，更由于其对他者、差异性、多元、异质、边缘的描绘而呈现出强烈的后现代指向。鉴于此，本文基于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理论，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结合后殖民印度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深刻探查萨利姆的生命历程和叙事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还原拉什迪对印度现实的批判和重构，从而挖掘小说的伦理价值，提供一个从伦理学角度认识《午夜之子》的新视角。

一、从“主角”到“他者”：萨利姆的“伟人”出生和“缺陷”人生

后现代西方伦理学主张承认差异、尊重他者，担负对他者的绝对责任，并以此为基础批判现代西方伦理学以自我为中心，排斥、蔑视、否定他者的观念。萨利姆的出生和成长一直处于国家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后殖民印度语境之中。虽然以“主角”的身份出生，但随着其人生轨迹逐渐偏离人们的“伟人”期待，萨利姆也因此被质疑、被嘲笑，慢慢成为人们眼中有“缺陷”的“他者”，受尽身处边缘的冷落和屈辱。小说对这一过程的披露展现了文本站在道德正义的立场对印度社会中充斥的狭隘、偏见和冷漠等意识的批判，体现出小说对独立之后印度社会现状的不满和担忧。

由于萨利姆神奇的“卡点”出生，他成为绝对的中心和焦点，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关爱”和“祝福”。诞生于印度独立当天零点这一巧合使他的命运“与历史神秘地铐在一起”（Rushdie 3）。一时间，记者、摄影师、政客等纷纷上门，用各种形式祝贺他的诞生。尼赫鲁总理甚至为他的生辰发来贺词：“亲爱的萨利姆娃娃，请接收我对你诞生这一大喜事的迟到的祝贺！你是印度那个既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面貌的最新体现。我们会最为关切地注视你的成长，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生活的镜子”（Rushdie 167）。家里人人对他寄予厚望，甚至为他创作了“无论你想要怎么样 / 你就可以怎样 / 你会实现自己所有的理想”（Rushdie 173）的摇篮曲。可见，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萨利姆的人生就处于国家话语的建构之下，被强行与国家的命运和家族的期望捆绑在一起。众人对萨利姆的众星捧月和种种期待，是由他们的伦理身份决定的。作为独立印度的一员，期待国家的新生和繁荣是他们的集体愿望，他们以守护和捍卫国家尊严和前途为首要和中心任务。正如萨利姆意识到的那样：“我四周的人似乎都具有清楚得要命的目的感”（Rushdie 210）。而萨利姆作为新生印度的隐喻，自然而然成为这种愿望的承载者和接收者。众人将国家的成长和未来具象化为萨利姆的成长和未来。在这种高度统一的对国家的责任面前，众人成为了理性原则的代表，他们对萨利姆的期望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得失心，而非发自内心的美好祝愿和衷心祝福。萨利姆很早就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期望得到丰富的回报。（……）他们指望从我身上得到巨额利润，那就是成为伟人”（Rushdie 215）。然而，“道德现象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因为只

有当它们优于目的考虑和得失计算时，它们才是道德的”（鲍曼 13）。没有非理性维度的加持，众人对萨利姆的种种期许，本质上是不道德的。萨利姆在理性原则的压制下被扁平化为一种类中心符号，成为了被剥夺个人欲望和理想的牺牲品。人们对萨利姆真正的喜怒哀乐并不关心，只关心后者是否按照他们的既有期待和规划成长、行动。在众人与萨利姆的关系中，萨利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人们想当然地把自己的臆想强加在萨利姆的身上，是对萨利姆不负责任的表现。他们的做法缺乏同情心和同理性，显出理性的冷漠和不近人情。众人代表的是一种主流的、同一的声音，他们推动构成了印度社会中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伦理关系，并不停地对萨利姆施加伦理压力，进行伦理暗示，逐渐成为干预萨利姆人生的不可抗力。

处于中心的萨利姆并没有收获生命的快乐，反而过早地感受到人生的压力和重担，出现异常的生理反应和精神焦虑，这反映出国家话语所代表的理性原则对人性的压制和导致的人的异化。面对来自各方的期盼，萨利姆一方面有意识地迎合大家的期望，另一方面却进行无意识的逃避，从而成为一个无解的矛盾体。在伦理身份上，萨利姆作为家中独子，最希望得到的就是父母家人的肯定。他渴望满足他们的期望，害怕成为“一事无成”的普通人，小小年纪就为“人生的目标”伤透脑筋。他无数次对着窗口茫然地问：“伟大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怎么才能搞到一些呢？又是在什么时候呢？”（Rushdie 215）还是孩子的萨利姆早早地就感知到身上的“重担”，开始出现明显的身份焦虑，具体表现为身体上的早熟和行为上的逃避。他食量惊人，生长速度奇快无比，新陈代谢十分旺盛。他总是躲在母亲卧室的洗衣箱，生怕暴露自己的迷茫和恐慌。洗衣箱在此充当了临时子宫的作用，象征着萨利姆一次次逃离自己被强加的理性枷锁，进入未出生前的自由状态。“感情已重获尊严，不可解释的而且可能是非理性的同情心和忠诚重新获得了合法性”（鲍曼 38）。洗衣箱是萨利姆为自己打造的情感空间，拒绝理性能量的入侵：“躲在洗衣箱里（……）摆脱了各种各样的压力，不必为满足父母和历史对我的要求而绞尽脑汁”（Rushdie 215）。萨利姆所感受到的重重压力，反映的是一种失衡的伦理关系。众人从“自我”出发所形成的与萨利姆的关系，恰恰使萨利姆失去了“自我”。这也暗示，萨利姆生活的印度社会在往单一、冷漠、狭隘的方向发展。

随着萨利姆一天天长大，人们发现其身上与“伟人”相去甚远的诸多“缺陷”，萨利姆也因此不断遭受来自众人的排挤，以至于无法在家庭和社会立足，沦为彻底的“他者”。首先是身体上有“缺陷”的“他者”，表现为外表的丑陋与身体的残缺。随着萨利姆年岁渐长，人们再也无法直视萨利姆的丑陋。据萨利姆自述，“我脸上（……）有几块胎记破了相。我右面发根处有几块黑色的胎记往下延伸，而左耳上有块大黑斑。我的鬓角太突出，就像鼓出来的拜占庭式建筑的圆顶。（……）像是发育不良的牛角似的鬓角（……）

大得像疯长的黄瓜一样的鼻子”（Rushdie 169）。在家中，父亲对萨利姆的长相一直心有芥蒂，尤其看不惯他的大鼻子；在学校，萨利姆甚至因为长相而遭到老师的当众羞辱和同学的集体嘲讽。地理老师把他的脸比作复杂的人文地理，嘲讽“这个丑猢猻的面孔就是全印度的地图”（Rushdie 321）。萨利姆不仅因此丢尽脸面，还被老师揪掉了头发，成为秃顶，引来更多嘲笑。不久，因看不惯丑陋的萨利姆收到女孩的跳舞邀请，同学格兰迪和佩斯极尽嘲讽和逗弄，最后在打闹中用门将萨利姆的中指夹断，造成萨利姆身体上的残缺。“我中指的三分之一掉在那里，就像是一块嚼得烂烂的泡泡糖”（Rushdie 325）。萨利姆因为外貌不断地以被嘲笑和被羞辱的形象出现，并用自己的身体为他人的恶劣行为买单。身体上的残缺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萨利姆坐实丑陋之名，越来越成为大家眼中不讨喜的异类。

其次是行为上有“缺陷”的“他者”，表现为无法为人道的秘密法力。九岁的一天，当萨利姆照旧躲在洗衣箱时，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某种法力：他能听到许多人在他脑袋里乱哄哄地说话的声音。很快他还发现，“这些声音可以调控——我成了个收音机，可以将音量缩小或者放大，我可以在其中进行挑选。我甚至可以借助意志的力量，将我新近发现的内在的耳朵关上”（Rushdie 226）。萨利姆误以为那是大天使们同他讲话的声音，天真地把自己当成了先知。他为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价值而激动得夜不能寐：“最后我终于看见天才的围巾就像一只绣花蝴蝶一般飞了下来，伟大的斗篷落到了我的肩膀上”（Rushdie 225）。第二天一早，他信心满满地召集家人，当众宣布自己伟大的“先知”身份，却遭到大家的一致奚落和攻击。愤怒的父亲更是一巴掌把他的左耳扇到失聪。当他跌倒并砸碎了一块绿色玻璃台面时，他好不容易发现的伟大“自我”也摔得粉碎。下面这段话值得回味：“我平生第一次对自己有了确定的感觉，我跌在绿雾般的带着锋利的刃口的玻璃碎片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我再也不能把我脑海中的一切告诉与我关系最密切的人。（……）我注定要不断地为我生活的目标是什么而时刻苦恼”（Rushdie 227-228）。家人的愤怒具有两重伦理因素：一。从宗教伦理的角度看，萨利姆一家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而萨利姆自称“先知”是对穆斯林教义的无知亵渎，触犯了宗教禁忌；二。从科学伦理的角度看，萨利姆的魔幻陈述超出了普遍的科学认知，听起来更像是没有逻辑的胡言乱语。双重伦理考量共同指向印度社会里既定的道德秩序和规范，而萨利姆魔幻的发言则违背了这些道德规范，扰乱了道德秩序，因而才会受到家人的指责和攻击。萨利姆天马行空的思想在高度务实的印度社会里显得格格不入，人们对此无法理解也无意沟通，只是机械地将其划为“异端”和“大逆不道”。

再次是身份上有“缺陷”的“他者”，表现为印英杂交的不明身世。就在父母打算为断指的萨利姆输血的时候，竟意外发现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原来，为了取悦身为激进分子的前男友，时任产科护士的玛丽悄悄进行

了一次“阶级革命”，竟调换了两个几乎同时出生的孩子的名牌。萨利姆其实是流浪艺人夫妇温吉和范妮塔的孩子，而穆斯林富商家真正的儿子湿婆却被送往贫民窟。雪上加霜的是，萨利姆其实也不是温吉的亲儿子，而是范妮塔与英国外交官苟合生下的野种。他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混血儿（Anglo-Indian mongrel）和私生子（bastard）。身世彻底暴露后，他几乎是一夜之间失去了父母的宠爱，先后被送往不同的亲戚家寄居。举家迁往巴基斯坦后，他终日混迹街头和窑子，还因为爱上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铜猴儿而遭后者唾弃。所有这些表明，萨利姆已经成为家庭伦理关系中的他者。不久，在印巴战争的纷飞烟火中，萨利姆的家被夷为平地，父母双亡，萨利姆本人被飞来的痰盂砸中，陷入昏迷和失忆。出于报复，铜猴儿把他送往军队成为军犬，吃狗食住狗窝，成为非人的人。“斯芬克斯之谜”摆在萨利姆面前，他是人是兽？失去了记忆的萨利姆，身上的“人性因子”几乎消失殆尽，大脑的宕机象征着伦理意识的暂时缺失，萨利姆身上的“兽性因子”（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8）占了上风，他成为了只有动物本能的兽。至此，萨利姆被彻底边缘化，甚至成为动物他者——一只来路不明的“斯芬克斯”。萨利姆复杂的身世，挑战了既定的血缘伦理关系，使得家族观念岌岌可危。父母的绝望和妹妹的报复表明，后殖民印度社会片面追求身份的纯粹性和本质性，无法容忍来路不明的不纯出生。

萨利姆逐步沦为“他者”的过程，也是小说持续批判将“自我”与“他者”对立起来的后殖民印度社会伦理观的过程。由于其“出格”的外表、行为和身世，萨利姆一直受到不公对待和谩骂侮辱，遭遇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透过萨利姆的不被认可和曲折人生，小说将一个排斥多元、缺乏包容心和同情心的印度社会呈现到读者面前——“一个把孩子生理或者心理上的任何异常之处都看作是家庭的奇耻大辱的国家”（Rushdie 234），暗示求同存异、平等对待众生才是后殖民时代印度的出路。

二、“他者”的力量：萨利姆的午夜之子和贫民窟

后现代伦理不仅批判自我与他者对立的道德关系，而且揭露和关注他者命运，为他者提供平等的言说渠道和表达空间，并借用他者反省自我。“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联优先于自我与他者的存在关系，他者的面容对自我是一种召唤和规训，他者的存在引导着自我的超越，只有超越自我，拥抱他性或外在性，才能克服唯我论，走向善良和和平”（陈世丹 尹宇 116-117）。无论是萨利姆，还是与之密切关联的午夜之子（大会）和贫民窟，都是他者或曰他者的象征。小说从萨利姆的视角出发，一方面聚焦午夜之子和贫民窟等弱势边缘群体的艰辛生活和悲惨遭遇，借此呼唤友善和责任、拒绝集权和暴力，另一方面强调午夜之子的生生不息和贫民窟众生的顽强生命，表达众生平等的伦理观和生命观。所有这些，表达出作者对印度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

和建设和谐印度社会的美好期许。

用“他者”来解读“自我”，往往能看到事物的真相，抵达事物的本质，知晓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人是自我的‘镜像’和‘面容’，它直接切近‘自我’和真理”（陈世丹 尹宇 118）。运用通灵术，萨利姆能够让自己的灵魂钻入别人的大脑，听取他人的所思所想。他先是深入父母与邻居的内心，发掘了各式各样的情感、苦恼、丑闻和罪恶。他第一次看到，在风平浪静的日常生活背后，每个人都有着不能见光的秘密：父亲对秘书的龌蹉思想、舅舅每况愈下的电影生涯、母亲对旧情人的思念、玛丽的负罪感等等。¹随后，他开始任由灵魂在全国漫游，在陌生人的心灵之间来去自如，发现了更多丑陋：践踏粮食的北方邦地主、奥里萨邦的粮食短缺、国大党工作人员的秘密行贿、孟买邦首席部长的喝尿癖好、总理的星象学迷信等等。²通过萨利姆的他者视阈，印度人民的喜怒哀乐变得鲜明，印度现实的阴暗面被揭开。后殖民印度社会呈现出表里不一的特征，在看似信心满满、斗志昂扬的建国热情中，其实充斥着迷茫、恐慌、怀旧、不安等各种情绪和混乱、无序、腐败、迷信等各类现象。小说对此类种种的揭示，正是一个提醒印度社会进行自我反省的过程。

“他者应该被听到”（戴维斯 155）。小说通过各种渠道，给他者提供发声的场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午夜之子大会（Midnight Children's Conference, 简称M.C.C.）。萨利姆用通灵术把所有的午夜之子集结到一起，于每天夜里召开畅所欲言的午夜之子大会：“五百八十一个各式各样的十岁孩子聚在一起，其吵吵闹闹、不守纪律的程度可想而知（……）整整一个小时里面，只听见双倍音量的叫喊、闲聊、争吵、嬉笑，叽叽呱呱地闹个不同”（Rushdie 314-315）。活跃的午夜之子大会与窒息的外部世界形成强烈反差，萨利姆坦白：“醒来时，我得面对各种各样痛苦的事情，母亲难忘旧情人，父亲日益衰竭，友情变化无常，学校里受人欺负。在睡梦中，我处于一个最令人激动的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是别的孩子从来没有见到过的”（Rushdie 315）。午夜之子在黑夜中还一起探讨人生目标和意义，进行哲学辩论，所涉及的话题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幼儿革命、资本主义、利他主义、妇女权力、土地财产等”（Rushdie 316-317），可谓囊括印度现实的方方面面。午夜之子来自印度的四面八方，他们的声音实际上代表了后殖民印度来自不同种族、阶级、信仰、语言和文化的人们被淹没的声音，客观反应了被遮蔽的社会现状和现实问题，以至于萨利姆感叹道：“这些孩子除了既有特殊天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整天想的也全是这些平常事情”（Rushdie 317）。这里的“平常事情”恰巧是印度社会正在经历和亟需解决的问题，而午夜之子从边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构成了促使印度反思和改善自身的重要力量。

1 参见 Salman Rushdie, *Midnight's Children*, London: Vintage, 2006, 235-237.

2 参见 Salman Rushdie, *Midnight's Children*, London: Vintage, 2006, 240-241.

后现代伦理拒绝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提倡多元性和包容性。在午夜之子的辩论中，萨利姆提倡包容和多元，而湿婆则代表僵化的二元思维。萨利姆强调思想、知识、人性、个性和艺术的重要性——“人类的自由意志（……）希望（……）伟大的精神，又称之为圣贤（……）还有诗歌、艺术，以及〔……〕”（Rushdie 355），而与萨利姆法力不相上下的湿婆则对萨利姆的倡议嗤之以鼻，遵循一种二元对立的单线思维：“只有金钱和穷困、富有和贫乏、右和左”（Rushdie 354）。面对这种“无穷无尽的二元对立论”（Rushdie 354），萨利姆呼唤团结和友爱：“〔……〕假使我们团结在一起，假使我们彼此相爱，假使我们向人们表明（……）永远同甘共苦（……）”（Rushdie 354-355）。对他来说，包容和宽容才是解决印度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只有坚持不同的原则，成为新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出生的使命！”（Rushdie 354）萨利姆与湿婆水火不容，构成了在午夜之子大会上交锋相对的两股力量，这正体现出两种伦理价值的交锋。小说借萨利姆之口宣扬以包容和多元为核心价值的伦理秩序，并通过表现湿婆的偏激蛮横和咄咄逼人表达对暴力和分离的批判，进而突出用多元原则建立一个和平、友善印度社会的愿景。

德里的贫民窟则被描写为一片多元和包容的乐土，那里遵循着友爱与和善的道德秩序，为萨利姆等无家可归的弱势群体提供容身之处。举目无亲的萨利姆被午夜之子之一的贫民窟女巫婆婆帝（Parvati-the-witch）带回德里的流浪艺人聚居区避难。那里是一番典型的多样化景观：乞讨的、残疾的、流浪的、变戏法的、玩杂耍的、搞催眠的、托钵僧等住在一起；他们解决争端的方式是和平且和谐的：“凡是发生口角啦或者其他问题啦都在‘画儿辛格’那顶巨大的无所不在的黑伞底下一一解决”（Rushdie 555）。与此相反，贫民窟外面的世界正在走向偏执的单一化，并逐渐陷入英德拉政府的黑暗统治中。贫民窟是各种不被强权社会承认的“他者”聚集的地方，是主流声音外围的“异声”，蕴含足够的反叛和革命精神。萨利姆模仿主流的声音，明贬暗褒：“江湖艺人几乎个个都是共产党，一点不错，都是赤色分子！叛乱分子，危害公共安全的人，社会渣滓——这么一群不信神的人生活在真主的房子阴影之下，真是对主的亵渎！”（Rushdie 553）在外人看来，聚居区是危险的地带，那里充满了危险的叛逆分子，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是印度社会的毒瘤。萨利姆却坦承，“这里的生活十分自在舒服”（Rushdie 553）。可见，贫民窟是包容之所，是真正提供友爱和和平的地方。

小说详细描写了政府针对贫民窟和午夜之子的极端暴力行动，表现对狭隘印度社会的控诉。首先，贫民窟在独裁政府名曰美化市容实则清除异己的行动中被夷为平地。政府派来的“志愿者”中，“所有的男子都有着同样的卷头发和女人阴唇那样的嘴唇”，“那些高贵的小姐也都完全是同一种模式”（Rushdie 599）。小说讽刺的语言表露出对这种傀儡般的冷漠的

批判。曾经一派祥和景象的贫民窟变成暴力的炼狱：“‘画儿辛格’将江湖艺人召集到他身边，他愤怒地挥动雨伞。这把伞曾经用来保证聚居区的和睦，如今成了武器，就像是堂吉诃德先生挥动的长矛一样。（……）就在此时，对贫民窟又发动了一场更加可怕的进攻，派军队来对付江湖艺人、女人和小孩了。（……）到处是枪托啪嗒啪嗒打人的声音（……）人们被扯住头发拖到等得不耐烦的运货车里……”（Rushdie 599-600）。其次，萨利姆和其他午夜之子受到囚禁和绝育。他们遭受的不仅是生理上的去势，还有精神上的伤残：“四百二十个人站在贝拿勒斯乱七八糟的小路上，在阳光下吧嗒吧嗒地直眨眼睛。四百二十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发觉在各人的眼睛里残留着被阉割的事，大家再也忍受不住，于是最后一次低声道别各奔东西，消失到茫茫人海之中暗暗疗伤了”（Rushdie 616）。午夜之子的存在，时刻提醒人们集权政府对印度人民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伤痕，更是精神上的创伤，在某种程度上掐灭了印度社会的进步力量和进取精神。无论是贫民窟众生还是午夜之子，都是英德拉集权政府眼中的他者。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表现出一个走向狭隘和失控的印度社会。

小说在极力批判针对弱势群体的暴力的同时，也给予他们绝地重生的希望，强调他们的乐观和顽强，从而体现出小说重建以善意和平等为道德准则的印度社会的愿望。旧的贫民窟虽然被铲除，但新的贫民窟很快出现，成为政府根本无法捕捉的存在。“据说在江湖艺人聚居区给推平以后的第二天，市中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贫民窟，紧紧靠在新德里火车站旁边。立刻派了推土机去对付那些小窝棚，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Rushdie 602-603）。贫民窟继续以它的方式存在着，为生活在边缘和底层的印度人民提供栖息之地。同样，午夜之子们虽然被集体绝育，落得无法生育后代的悲惨下场，但是他们的子孙其实已经遍地开花，这得益于湿婆——曾经的午夜之子之一——与多个印度女人产下的无数私生子——也包括阿达姆·西奈（Adam Sinai）。“这位战斗英雄自由自在地在印度大地上到处留下私生子”（Rushdie 571）。湿婆先是流连于有钱女人堆里，使得“有钱人家的摇篮里增加了不少活蹦乱跳的漂亮婴儿”（Rushdie 575），后又沉迷于妓女丛中，“在首都生下了一大堆在街上胡闹的顽童，这跟他和金碧辉煌的客厅里的太太们生出来的那一大群私生子简直可以相映成趣”（Rushdie 575）。如此一来，午夜之子的后代对印度社会的不同种族和阶层进行了渗透，哪里都有他们的存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携带着午夜之子关注社会问题、向往美好生活的优良品质，成为影响印度未来的关键力量。小说以阿达姆·西奈为例，描绘了他们潜在的巨大能量。阿达姆有着纯净的蓝眼睛、一对招风耳和不轻易发出任何声音的嘴巴，所有这些指向一个耳聪目明、警言慎行的形象。他一出身就疾病缠身，不发出声音也不说话，不睁开眼睛也不吃药，不对人微笑也不向人索取。萨利姆意识到：“他是在‘紧急

状态’下出生的，他将会而且已经谨慎得多，耐心地等待时机。但等到他采取行动时，他是不可抗拒的。他已经比我更加厉害、更加强硬、更加坚决（……）”（Rushdie 594）。从隐喻的角度来看，阿达姆是在无声地对抗着不堪的印度现实。果然，当黑暗的“紧急状态”时期结束后，阿达姆也恢复正常，正式开启他的成长之路。萨利姆意识到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来临：“阿达姆是第二代具有魔力的孩子中的一员，他们将来长大了会比第一代利害得多。他们不会去算命或者从星象里寻找自己的命运，而是在自己坚不可摧的意志的熔炉里锻造它”（Rushdie 626）。正是这些孩子的存在，给予印度新的希望。他们见证过暴力与黑暗，因此比任何人都向往和平与安宁。

总体而言，小说通过对午夜之子和贫民窟众生等边缘弱势群体的描写，集中披露了印度社会存在的暴力和集权，从而暴露后殖民印度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困境，能够对印度社会反省自身起到提醒作用。同时，小说将善意和责任的种子播散在午夜之子的后代身上，暗含对建立一个美好的印度未来的期许。

三、众声喧哗的历史：萨利姆的多元叙事策略

后现代作家还运用后现代伦理的叙事手法，消除作者的叙述权威，取消文本中的叙述中心，尊重差异和他者，进行狂欢叙事和互文叙事，以此表现后现代伦理思想。所谓后现代伦理的叙事就是消除作者权威、叙述者中心，采用多角度观察、多叙述者、多声音、多样化的叙事，这种去中心、尊重差异和他者、平等对话的叙事形式与后现代伦理学的主张是一致的，主要表现为狂欢话叙事和互文叙事。当小说主人公萨利姆在危机四伏的印度社会中夹缝求生时，小说叙述者萨利姆显然略高一筹，他在回忆打造的叙事空间里如鱼得水，用灵活跳跃的语言回顾自己的个人历史、还原他眼中的印度历史。总体来看，萨利姆的叙事是在后现代伦理观念和道德原则的影响下进行的语言实践。叙述者萨利姆运用“腌制化”写作、不可靠多角度叙事和非线性叙事等多元叙事策略，消解历史书写中正确与错误、虚构与真实等的界限，并最大限度地编年史的单一中加入不同的声音和元素，从而从根本上解构官方印度历史的权威和单调，为重构一个包容、多样和多元的印度社会提供方向。

叙述者萨利姆进行了带有实验性质的“腌制化”写作，其实质是一种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历史叙事。萨利姆从泡菜腌制中获得灵感，认为自己找到了叙事的法门。他发现：“腌制过程的象征意义是，生出印度人口的六亿个卵子可以塞进一个正常大小的酱菜瓶子里，六亿个精子可以用一把汤勺舀起来。因此，每一个酱菜瓶（……）都包涵了最为崇高的可能性，那就是将历史做成酸辣酱的可行性，以及将时间腌制起来的伟大希望！”（Rushdie 642）模拟泡菜的腌制过程，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腌制化”叙事，即在叙述的过程中加入“回忆、梦想、观念”（Rushdie 643），并通过控制各种

主观元素的份量和比例，调制出一种多元味觉和面貌的历史叙事。通过这种叙事，萨利姆希望历史能以鲜活的方式保存下来，不被遗忘。三十个章节被比喻为三十个泡菜瓶子，每个瓶子里装有腌制过的印度历史——“架子上已经有了三十个瓶子，准备送出去让这个患有遗忘症的国家使用”（Rushdie 643）。萨利姆自信满满：“凡是吃过它的人就会知道胡椒瓶在巴基斯坦起了什么作用，或者在桑德班斯丛林里会有什么感觉”（Rushdie 643）。不仅如此，多种个体经验和主观意识加入，极大地增添了历史故事的魅力和层次，给予人们解读印度历史的不同体验。“或许有一天，世界会品尝一下腌制的历史。对某些人来说，它们也许味道太重，它们的气味也许有点冲鼻子，也许会激得人眼泪直流。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说它们的味道完全货真价实，反映了真相”（Rushdie 644）。借助“腌制化”叙事，小说有意消解印度官方的权威历史，从个人和主观角度还原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提醒印度人民不要遗忘历史。

萨利姆采用不可靠的互文叙事策略，模糊正确与错误的概念，进一步解构印度官方历史的权威。拉什迪故意让萨利姆的叙事错漏百出，制造一种记忆混乱的假象，从而混淆正确与错误的概念。比如，圣雄甘地的死亡日期明显与史实不符；又如，印度教神话中象头神（Ganesha）坐在毗耶娑（Vyasa）脚边记录《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这一经典场景也被篡改，变成象头神坐在蚁垤（Valmiki）的脚边写下《罗摩衍那》（*Ramayana*）；再如，萨利姆先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宣告了湿婆的死亡，后又主动承认自己的草率，声称他并没有找到湿婆死亡的确切证据——“说老实话，有关湿婆之死我扯了谎”（Rushdie 619）。总而言之，叙述者“极其不可靠，不仅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而且经常是彻头彻尾的狡辩”（Booker 983）。可见，拉什迪善于挪用各种历史、宗教和神话典故，使小说文本在呈现强烈的互文性的同时，又不乏戏谑和揶揄。由于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读者时常感到困惑，他们突然发现“不可能就文本中哪些是真（正确）的，哪些是假（错误）的得出任何令人满意的结论”（Booker 983）。正如叙述者走下神坛，向读者袒露自己的主观偏见一样，历史在他的书写中也变得亦真亦假，古老的宗教和神话变得模糊不定，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没有中心、没有支点。拉什迪借此消解历史权威，为读者开放一个自由解读印度历史的空间。

萨利姆还善于用叙事操纵现实，从而模糊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萨利姆有意区分他叙述的印度和现实存在的印度：让甘地在错误的时间死去，让印度大选的日期提前。萨利姆故意让读者明白，他是站在边缘人的角度上书写一部后殖民印度史。大卫·沃特森（David Watson）有言：“语言不是一面空镜，等待着被历史和民族（历史上的主导事件）的形象所填充；它正是创造和决定这些叙事的力量”（218）。通过语言的力量，萨利姆拆解了虚构和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甚至提出了一种反转。虚构可以创造现实，而现实可

以服从于虚构。“历史的书写和历史的事件之间的传统联系被打破了”(Watson 218)。萨利姆所创造的虚构印度不是作为外在印度的参考,而是平行的另一个印度,虚构印度与现实印度形成了一种平行结构,他们是平等的、对话的关系。萨利姆问道:“一个错误是不是会将整篇东西的真实性毁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不顾一切地追求人生的意义,因此到了颠倒是非的地步——只是为了把自己置于中心的地位,我才来重写我那个时代的历史呢?”(Rushdie, *Midnight's Children* 250)这看似反思的反问实则暴露了叙述者萨利姆维护平等、开放对话的决心:虚构历史也能反应现实历史,现实历史却不一定是真实历史。

此外,萨利姆奉行一种双层或双视角叙事,制造出叙事主体的双重或多重声音,使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多声部特征,从而进一步突出所叙述的印度历史的多样和复杂。萨利姆一方面向情人博多叙述自己所经历的印度历史,两者因此构成直接的叙述者与受述者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化身元小说评论者(metafictional commentator),与他假想的文本外读者互动。元小说评论者是叙述者的有力补充和必要支撑。当博多指责萨利姆讲述历史的方式时,元小说评论家往往站出来为叙述者进行辩护,邀请隐形的读者理解叙述者。元小说评论者同时也是叙述者的提醒人,一个高于讲故事的人的局外人,敦促后者站在叙事的角度上与被描述的历史保持距离。每当叙述者萨利姆陷入某段回忆无法自拔或历史来到戏剧性的节点时,评论者萨利姆就跳出自嘲一番,诸如“我似乎被这个广播隐喻困住了”(Rushdie 338)或“我为这戏剧性的场面道歉”(Rushdie 513)这样的自评四处散见于文本之中。尼尔·登·考特纳(Neil Ten Kortenaar)注意到,“萨利姆身上的某一部分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表现出一种来自个人的痛楚;而他的另一部分则能够站在外围,坚持告诉读者真相”(245)。这正是叙述者与评论者之间进行的视角商榷。当萨利姆不断地进出不同的叙事框架时,他的视角也在不断调整,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位置之间来回移动,代表着不同的声音和一种超越主体性的对话。可见,萨利姆拒绝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来展开历史叙事,而是打破传统而单一的“叙述-受叙”二元模式,使历史书写处于一种流动的对话状态,从而为印度历史提供了多重意义和可能。

萨利姆还是非线性叙事的忠实拥护者,他笔下的印度历史也因而具有了绵延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开放性。山鲁佐德为了活命,连续讲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论其秘诀,那就是不停地设置悬念、延迟和离题,山鲁佐德也因此成为非线性叙事的象征。这与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去权威的宗旨不谋而合,非线性叙事也因此成为后现代写作的典型叙事策略之一。萨利姆自诩泡菜厂的山鲁佐德,自知命不久矣,于是打算用叙事来记录印度历史。他说:“要是我想最终留下一点什么有意义——是的,有意义——的东西的话,我必须加紧工作,要比山鲁佐德更快”(Rushdie 4)。然而,他所理解的印度历史是

高度繁杂且多样，无法用简单的叙事将其囊括。“有这么多的故事要讲，太多了，这么多的生命、事件、奇迹、地方、谣传交织在一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和尘世间常见的东西紧密地混杂在一起！”（Rushdie 4）鉴于此，萨利姆在叙述中并不完全遵循时间和逻辑顺序，而是更多地遵循自己的情感需要，因为“那么多东西在我肚子力推推搡搡”（Rushdie 4）。他经常停下来解释那些似乎与故事主线没有直接联系的事情，善于通过频繁的分心和离题设置悬念，惹得信奉“接下来发生什么主义”（what-happened-nextism）的听者博多颇不耐烦。萨利姆把她描述成一个缺乏领悟力的浅薄听众，从而凸显其叙述的印度历史的深刻与复杂。他感叹道，“有时候，我真希望找到鉴赏水平更高的听众，希望这个人能理解叙述中需要节奏、步调巧妙地引进一些将来能发展、壮大从而成为主旋律的小调和弦”（Rushdie 135）。萨利姆与博多在故事讲述方式上的分歧甚至争吵，实际上体现的是历史观念上的分歧。博多钟爱的线性叙事体现的是一种冷漠、理性、封闭的历史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印度历史是冰冷的、客观的、单调的现实。而萨利姆的非线性叙事体现的则是一种温情的、感性的、开放的历史观念，印度历史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成为有温度的、有声音的、有色彩的文本伦理。非线性叙事本质上体现出一种后现代伦理，它以包容之姿允许悬念、隐瞒、推迟、分支、曲折、漏洞等，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了叙事生命，开放了《午夜之子》作为历史小说的内涵。

《午夜之子》是一次重构后殖民时代印度社会道德关系的伦理叙事。小说批判后殖民现实对萨利姆、午夜之子和贫民窟居民等弱势群体他者的迫害和暴力，宣扬蕴藏在他者身上的真善美和进取力量，以此呼唤一个以友爱、和平、平等为道德规范的印度社会。与此同时，小说采用“腌制化”写作、不可靠多角度叙事和非线性叙事等手法解构印度历史的权威，试图建构起包容多元的印度景观。拉什迪在写作中从文本内外对后现代伦理思想的突出建构使得《午夜之子》具有了较高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小说提醒印度人民在勿忘殖民伤痛历史的同时，更要正视印度社会的残酷现实，同时用乐观、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迎接后殖民印度的未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让《午夜之子》在出版 40 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重新焕发新机。

Works Cited

-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
 [Bauman, Zygmund. *Postmodern Ethics*, translated by Zhang Chengga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 Press, 2003.]
 Booker, M. K. "Beauty and the Beast: Dualism as Despotism in the Fiction of Salman Rushdie." *ELH: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4 (1990): 977-997.

Brennan, Timothy. *Salman Rushdie and the Third World: Myths of the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陈世丹、尹宇：“沃尔曼作品中的回应、面对、正义和移情——后现代他者伦理观”，《外语与外语教学》3（2019）：116-124。

[Chen Shidan and Yin Yu. “Response, Face, Justice and Empathy in Vollmann’s Works: A Post-modern Ethics Towards the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3 (2019): 116-124.]

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Davis, Colin. *Levinas*, translated by Li Ruihua. Nanjing: Jiangsu People Press, 2006.]

Kortenaar, Neil Ten. *Self, Nation, Text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 Childre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P, 2004.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20): 12-22.]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Rushdie, Salman. *Midnight’s Children*. London: Vintage, 2006.

Watson, David. “Borderline Fiction: Writing the Nation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Tydskrif vir Literatuurwetenskap* 14 (1998): 213-227.

徐彬：“拉什迪的斯芬克斯之谜——《午夜之子》中的政治伦理悖论”，《外语与外语教学》4（2015）：86-91。

[Xu Bin. “Rushdie’s Sphinx Riddle—the Ethical Political Paradoxes in *Midnight’s Children*.”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4 (2015): 86-91.]

——：“后殖民伦理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聂珍钊、王松林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36-153页。

[—.“Postcolonial Ethical Criticism.”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Beijing: Peking UP, 2020. 136-153.]